

第一章 導論

民主化是近來政治學的一個熱門研究領域，自 1980 年起的南歐、拉丁美洲一直延續到 90 年代的東亞，民主化的一般性理論大體已經建立，主要有兩個方向，一個是注重靜態的前提論，認為非民主國家若具備了歐美先進國家的經濟、社會結構，政治民主化也將水到渠成。另一則是注重動態的過程，將重點擺在威權體制如何被沖垮。而本文將以過程途徑研究中國大陸 80 年代的民主化過程。

第一節、研究動機及目的

本文首先要定義民主及民主化，以釐清中國大陸是否在 1976-1989 年有過民主化的經驗。

民主和民主化是兩個概念，民主是名詞，民主化是動詞，當我們問某個國家有沒有民主時，意謂著該國家是否有定期的選舉？是否有一個為人遵守、信任的憲法及憲政體制？而當我們問某個國家是否有民主化時，並不一定是指該國已經有了民主，而是在問該國是否有從政治光譜威權的一端，往民主的一端移動的傾向。中國大陸在 80 年代是否有民主化，本文是採肯定的態度。

O'donnell 和 Schmitter 定義政治轉型(transition)，政治轉型是指由一個政體(political regime)過渡為另一個政體，政治轉型可分為兩個部分，第一個步驟是崩解威權政體的發動，第二個步驟是某種型式民主的產生，但有可能附屬威權統治之中。¹另外 Przeworski 也定義了民主化的兩個步驟，他認為第一步是威權體制的鬆綁 脫出，第二步是民主體制的建立，而在民主化之前有一段自由化的過程。

2

¹ O'Donnell, Guillermo and Philippe C. Schmitter, *Transition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Tentative Conclusions*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6.

² Adam Przeworski, "The Games of Transition," in Scott Mainwaring, Guillermo O'Donnell, and J.

中國大陸在毛後，威權體制有或多或少的鬆綁，在毛時代，群眾運動的發起，多是中央授意，幾乎沒有民間自發性群眾運動性的可能，但毛後，包括民主牆運動、86年的學潮，乃至89天安門民主運動，都不是中共所預期會發生，中共中央也都無法完全掌控運動的情勢與發展。更遑論對在這些運動中活躍份子平日言行的掌控，方勵之在去美國前，常至中國大陸各學校演講，王丹也在北大主持了大大小小的民主沙龍，這些都是毛時代難以想像的事情。

就如台灣在國會全面改選前難稱為一民主國家，但全面改選前，黨外、民進黨各個大大小小的街頭運動，代表國民黨的統治能力已經下降，台灣已經進入民主化的階段。

民主在大陸存不存在，若以最基本的民主規範：(1)民選產生的官員；(2)自由且公平的選擇；(3)普遍的選舉權；(4)參與公職選舉的參政權；(5)言論自由權；(7)新聞自由權；(8)結社自由權，³以此來檢驗中國大陸，答案當然是否定的。但不管民主化有沒有成功，不能否認中國大陸民主化在80年代的進行。

本文認為，儘管在選舉方面，大陸在80年代沒有太大進展，但方勵之和溫元凱等著名民主人士，在1986年地方的人大代表，能以高票擊敗中共黨中央欽點的人選，表示至少在地方一級的人大選舉，若候選人和選區有配合，儘管沒有中共黨的資源、背景，仍有辦法和中共推薦的人選一搏，例如方勵之和溫元凱在選區為中國科大，選民多為學生或知識份子的情況下，可當選地方人大。方勵之的太太李淑嫻也曾在海淀區以高票當選了人大代表。當然這都是一個點一個點的突破，並非一個面式的通例，但也可看出中共控制力的下降。

而在廣泛的政治參與，與保障少數者的權利及基本人權方面，和毛時代相比當然有所進步，但很顯然地並沒有達到民主的門檻。不過整個趨勢的發展是可以觀察到的。

本文對毛後中國大陸民主化(1976-1989)的研究，主要注重過程。1976年，

Samuel Valenzuela, ed., *Issues in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92), pp. 107-117.

³ Robert Dahl, *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221.

毛澤東去世，如同其他的專制國家，中國大陸的權力鬥爭開始展開。在極權專制國家中，領導人接班往往是沒有制度化的，也因此為了爭奪大位，各種光怪陸離的事情都會出現。以毛澤東時期來說，早年他挑選了劉少奇，但後來卻硬把「中國的赫魯曉夫」套在他頭上，甚至病入膏肓時，竟不能享有被治療的權利，就這樣病死在囚禁的小房間中；林彪曾經是毛澤東的親密戰友、接班人，還明定在黨章之中，後來卻想發動政變謀殺毛澤東，事蹟敗露後在飛往蘇聯的途中不知何原因而墜機身亡。

不過那是毛澤東時代，毛澤東作為中共的第一代領導人，同志們與群眾的擁戴及造神運動，使得他具有控制一切的權力，對於接班人問題，在他活著的時候，大體都受他所控制。

儘管如此，他仍不時地發動群眾，以各種運動來達到他的政治目標，但是在他認為群眾超過他的控制時，他又會將群眾運動壓下來，他也有能力將群眾運動壓下來，不至使群眾運動對共產黨及他的統治產生傷害。翻開中共黨史，我們至少可以看到反右運動及紅衛兵這兩個顯著的例子。

但在後毛澤東時期，權位的爭奪已經沒有一個如毛澤東一般已被神化的魅力型領袖得以全盤掌控，因此各派勢力在競爭時，往往會援引社會力量來圖利自己。但是，社會力量也會反撲，同時也沒有像毛一般的魅力型領袖有足夠的能力來鎮壓，被喚起的社會力量將侵蝕到威權體制的基礎。

另外在研究中國大陸政治發展的過程中，也有很多方向切入，而派系途徑自 70 年代開始成為中國研究的重點研究途徑之一，因為在政治未制度化的國家，非正式政治將主導政治的發展，即使到了鄧小平時代，中共有意建立一套政治制度，如超過 70 歲的幹部需退休、黨政分開……等，但事實上非正式政治的力量還是比較大的，如鄧小平照理說應該不能再干涉政治，但是鄧垂簾聽政，重要的決策，如換下胡耀邦、天安門事件的鎮壓、南巡講話等事件，都是鄧的決定。吳玉山與 Dittmer 也認為在政治正當性在傳統型或魅力型的政治系統中，即使是一個法理型的決策，如立法通過的法規或官僚體系的合法作為，仍然會帶有非正式

政治的色彩⁴。李南雄認為中國大陸的非正式政治分為正常型式(functional informal type)與非正常型式(dysfunctional informal type)兩種，前者包括領導核心等，而後者則包括了個人崇拜、派系主義、「獨立王國」等，而派系行為屬於後者。⁵

中國大陸雖然試圖建立制度化的政治系統，但是非正式政治的力量顯然還是大的多，因此本文也將會以「派系」來解釋鄧時代的政治發展，以及自 1976 開始的民主化。但本文主要以過程途徑研究 80 年代中國大陸政治民主化，過程途徑認為政權內部產生溫和/強硬兩種路線，開啟了整個民主化的過程。因此本文在對中國大陸鄧掌權後派系的分類，大體是分為改革與保守兩派，沒有進行太細的分類。

第三波的民主化始自 1970 年中期的南歐，一路擴展到亞洲、中南美，甚至沖垮了共產主義世界，在 1973 年民主國家占全球所有國家 24.6%，到了 1990 年，則占了 45.0%。⁶中國大陸搭上了這班民主化列車，但是沒有抵達終點，在 1989 年天安門事件宣告失敗，威權政府體制持續地保有權力。

Samuel P. Huntington 認為有幾個因素，導致了民主化的發生，他認為一個國家在第一波、第二波民主化波段是否有過民主的經驗，將會影響該國在第三波民主化的轉型與否。但是在第三波末期，有些從未有民主經驗的威權國家仍成功轉型，例如台灣、墨西哥和東歐國家等，因此他歸納了五個在第三波民主轉型後期的關鍵原因。(1)正當性(legitimacy)危機；(2)經濟發展促成龐大具公民意識的中產階級；(3)宗教的因素；(4)外來勢力的促成；(5)示範效應。⁷現代威權主義的統治正當性來自民族主義及意識型態，以中國大陸為例，其正當性來自共產主義社會的理想及使中國富強的藍圖，後者似乎更為重要，共產主義僅是其使中國富強

⁴ Lowell Dittmer and Wu Yu-Shan, "The Modernization of Factionalism in Chinese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vol.47, no. 4 (1995), pp. 468-471.

⁵ Peter Nan-shong Lee, "Informal Politics and Leadership Succession in Post-Mao China,"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no. 32 (1992), pp. 219-232.

⁶ Samuel P. Huntington, 劉軍寧譯，《第三波：二十世紀末的民主化浪潮》(台北：五南，1991)，頁 3-23。

⁷ 同前註，頁 39-109。

的路徑。

表一之一 第三波民主化潮流

年分	民主國家	非民主國家	國家總數	民主國家 在所有國家的百分比
1922	29	35	64	45.3
1942	12	49	61	19.7
1962	36	75	111	32.4
1973	30	92	122	24.6
1990	58	71	129	45.0

資料來源：Samuel P. Huntington，劉軍寧譯，1991，《第三波：二十世紀末的民主化浪潮》（台北：五南），頁 23。

註：本表估計的國家不包括人口不足一百萬的國家

中共官方編修的黨史或中國現代史，皆從鴉片戰爭中國遭列強欺凌說起，中國共產黨的創建正是為了帶領中國現代化與世界各強國並駕其驅。自其建政之後，即不斷地向人民洗腦，唯有馬列毛思想、社會主義、共產黨能救中國，但是當文革結束、毛澤東過世之後，中國大陸民眾發現似乎不是這麼一回事，意識型態的破產使共產黨的正當性遭受質疑。因此共產黨也明白必須有所改變、勵精圖治，以政績挽救其統治正當性，故有了四個現代化、改革開放等政策，在政治上也比以前較為寬鬆。

而中共所謂「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說法，正是試圖以經濟發展來穩固統治正當性的方案，一個中心即是以經濟為中心，兩個基本點包括改革開放和四個堅持，只要經濟發展的好，四個堅持中的堅持共產黨領導就可以穩住。但也因為有一些人先富了起來，從兩方面影響了民主化的展開，一是城市中的居民開始有餘裕關心政治事務，產生公民意識；二是雖然經濟發展但是所得分配不均，貧

富差距拉大，造成人民對共產黨統治的不滿。

在國際因素方面，Huntington 認為蘇聯放棄其老大哥的地位及美國的促成分別對東歐國家和拉丁美洲的民主化有正相關的關係，但在中國大陸，雖然是社會主義國家，但其與蘇聯已在 60、70 年代鬧翻，又採取鎖國的政策，不像拉丁美洲或南韓、菲律賓甚至於台灣，經濟上依賴美國所以有讓美國介入政治轉型的機會。因此外來勢力的介入對中國大陸民主化似乎沒有那麼明顯。至於 Huntington 所說宗教因素則影響中國大陸政治轉型較少。

但 Huntington 也認為，上述只是民主化一般性的原因，產生了有利於民主化的條件，不一定就會民主化，有利於民主的社經條件，並不足以產生民主，「一個民主政權不是由民主化的潮流建立起來的，而是由其人民建立起來的」。民主化還是決定於政治領袖與民眾的互動，而政治領袖促成了民主化，其動機是複雜的，甚至他們自己也不清楚。但無論政治領袖的動機為何，他們採取行動，例如局部的自由化，才有可能導致民主的出現。「在第三波中，創造民主的條件必須存在，但是只有政治領袖願意冒民主的風險時，民主才有可能出現」。⁸

尤其在社會主義國家，政治領袖更迭是影響政治變遷的主因，國家對於社會、經濟的全部掌控，民眾鮮少能對政治變遷發生什麼作用，例如研究蘇聯的學者 Seweryn Bialer 認為，蘇聯的政治變遷多半是來自精英的變動，在權力高度集中的共黨體制中，領導人的更換往往就是政治體制的改變。⁹而在中國大陸，毛澤東死後顯然是一個全新的時代開始，四人幫、華國鋒、鄧小平等，都在趁著毛澤東死後政治真空期間爭取最大的權力。

由於共產政權對於社會體制的高度控制，政治改革無法是由民間由下而上的發動，共黨高層各派別在權力鬥爭期間，改革派援引社會力量往往成了政治轉型的切入點，由上而下的政治改革，成為自由化的起因。在凡是派和實踐派的鬥爭中，鄧小平曾運用了民主牆運動來對抗華國鋒，之後黨內改革派也曾多多少少和

⁸ 同前註，頁 109。

⁹ Seweryn Bialer, *Stalin's Successors: Leadership, Stability, and Change in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69-79.

民間力量聯合。

而本文選擇 1989 年作為本研究的結束點，則是因為 1989 年的天安門事件之後，威權體制又重新鞏固，之前十多年的自由化成果付之一炬。以 Adam Przeworski 的分析途徑，大規模的街頭運動後，將有兩個選擇，(1)深化改革，威權體制完全崩潰，往民主政體過渡；(2)鎮壓反動運動，重回威權體制。¹⁰1989 年的天安門事件，中共以武力鎮壓的手段結束了這波自毛澤東之後開始的政治轉型。借用 Huntington 的概念，1989 年至 1990 年初期是中國大陸的一波民主化回潮，¹¹1990 中期至今(2004 年)的零星民主運動，則應視為另一波的民主化運動，而非自毛死後政治轉型運動的持續。因此本研究的时间點設定在自 1976 年至 1989 年。

80 年代的台灣和中國大陸，都有自由化運動，都有一波一波的群眾運動，也都有學生運動，但為何台灣最後順利的往民主過渡，但最後中國大陸卻是以鎮壓做為這一波民主化的失敗，本文認為以過程途徑可以對此有效地解釋。

本研究的重點將以民主化為主，並且因為過程途徑特重「菁英」所扮演的角色，因此也將探討中共派系作為重點之一，而本研究的目的則在探討分析下列幾個問題。中國大陸的政治民主化過程如何開始？民主化的過程如何進行？中共政權內的派系之間的互動為何？其互動對民主化如何產生影響？民主化為何失敗而又重回威權體制的原因何在？

¹⁰ Adam Przeworski, 張光、馬俊峰譯,《民主與市場》(台北:桂冠,1998),頁 74-77。

¹¹ Huntington 的民主化回潮原是指民主體制崩潰重回威權體制,但 Huntington 提到台灣五十年代容忍自由派異議分子,但在六十年代任何形式的政治討論都被鎮壓,亦歸於第二波回潮,可見回潮概念不局限於民主體制的崩潰。因此本文將中共政權取消原有少許的自由化改革成果,稱為「中國大陸的民主化回潮」。Huntington,《第三波:二十世紀末的民主化浪潮》,頁 17-18。

第二節、文獻檢閱

研究中國大陸的民主及民主化可由許多角度切入，例如從文化方面分析¹²；另外也有從制度面著手，吳稼祥認為中國做為一個大國，而民主是適合小國的制度，因此中國應該從聯邦制著手，嚴家其也提倡聯邦中國的構想，既可帶來民主，亦可解決兩岸問題，Goodman 也認為中國幅員廣大、各省風土民情也都不一，這必須列入中國大陸民主化研究的變數之一¹³；當然也有從社會經濟背景因素分析中國大陸民主化為何失敗的研究。¹⁴

黎安友整理出各學者認為中國民主在歷史上，之所以失敗的九大原因：民主僅是團結及動員的口號、國內外戰爭、軍閥干政、中國的政治文化、經濟不發達、農民群眾占人口比例太多、中國憲法設計上的缺陷、民主派道德上的失敗、菁英互動。¹⁵以上大概可分為制度因素、文化因素、社經因素，但黎安友認為菁英互動才為民主化的關鍵要素。

黎安友也討論了台灣民主化的個案，利用菁英互動的過程途徑進行分析，他認為蔣經國的政治價值觀與使命感是台灣能民主化的關鍵因素，而國際壓力和民進黨所給予的壓力也佔了部分因素。¹⁶

本文認為鄧小平如果也有民主化的意志，中國大陸在八十年代並非沒有民主化的可能，台灣和中國大陸的社經背景固然不同。但以過程途徑來解釋，政治菁英、政權領袖，才是民主化的關鍵因素。背景因素，包括國外壓力、經濟發展與否，都是次要的因素，但儘管如此，背景因素的交代可以讓研究更加的清楚，可以更了解政治菁英為何會做該決策。

¹² 如金耀基，《中國民主之困局與發展》（台北：時報，1991）。

¹³ 參閱吳稼祥，《頭對著牆：大國的民主化》（台北：聯經，2001）；嚴家其，《民主怎樣才能來到中國》（台北：遠流，1996）；David Goodman，大陸系統下的政治變遷：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主化的展望，收錄於田弘茂，《新興民主的機遇與挑戰》（台北：業強，1997），頁 434-436。

¹⁴ 如楊仲源，《中共經濟改革對大陸民主化之影響：以八九年民運為例》，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

¹⁵ 黎安友，《蛻變中的中國》（台北：麥田，2000），頁 106-117。

¹⁶ 同前註，頁 139-163。

本文接著將檢閱白魯恂及黎安友對派系的研究。白魯恂論及派系在中國政治的角色，他認為討論這個問題之前，必須區別派系與利益團體，中共派系為了安全感的增加形成相互的信任與忠誠，雖然某政策可能成為某派系的標籤，但並不能推論派系是由於政策偏好不同而形成。他也不同意將派系與意見團體相混淆，派系是建立在人與人的關係上，不會因意見不同而脫離派系，而意見團體是可以在新事端發生後因新的看法而重新組合。¹⁷

白魯恂眼中的中共派系的形成，主要不是反映政策、官僚利益、世代差異或省籍。幹部間的派系基礎是尋求職業安全感和保護權力，派系基礎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白魯恂以文化角度闡述，認為中國文化上級和下屬有強烈的互惠需求，每一個人都需要他人作為自己的屏障，但也因此容易受到他人攻擊，因此他們必須互相忠誠。中共派系的力量是個體間的個人關係，運作在一個階層的組織系統中，產生連結網絡，向上擴展為對某些領導者的支持，反之領導者也尋求跟從者以確保他們的權力。¹⁸

白魯恂重視派系的垂直關係，認為派系中的關係多為領導者與其追隨者的互動，對水平的聯繫並沒有多加著墨。

本文認為，白魯恂太過強調「效忠 保護」的探討，認為利益相關才是派系形成與維繫的主因，但本文認為這種觀點太過於偏重權力，會造成解釋的盲點，例如鄧小平的對改革開放政策是很堅持的，他講過「誰不搞改革開放，誰就下台」，因此對政策的不同看法而形成派系的力量，本文覺得白魯恂是低估了。

派系的目的是在於權力的取得、維持與擴大，尤其本文研究範圍為毛後權力轉移的時空背景，派系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不言而喻。Bialer 曾經評述蘇聯的政治體系，他認為繼承、權力轉移的問題在研究蘇聯政治發展時非常重要，他說：「沒有一套預先確立最高領袖執政期限的規定，也缺乏一套涉及職位任期的規定，提供每一個執政者規範的權責和權力，也沒有前例可循為在位者讓予權力的標準。

¹⁷ Lucian W. Pye, 胡祖慶譯,《中國政治的變與常》(台北:五南,1988),頁7-12。

¹⁸ 同前註,頁23-25。

在選擇新領袖，以及新領袖在鞏固其地位的過程中，蘇聯較其他政體更難預測且不確定性更高。在權力轉移的期間，蘇聯的政治過程與其正常時期多了許多不確定因素。」¹⁹這段分析對於中共權力繼承與移轉具有相當的參考價值。

尤其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共也試圖將政治制度化，鄧小平試圖防止派系主義，而強調程序的規則性和恢復黨內會議的民主討論。中共宣示建立集體領導班子，反對個人專制，積極地處理接班的問題，但是隨著胡耀邦、趙紫陽的下台，可以驗證制度化在 80 年代還不能說是成功，非制度化的因素仍舊是影響高層政治的關鍵。

黎安友在 1973 年發表的文章也是以派系途徑研究中國政治的重要文章，黎安友在文中提到：「沒有任何派系能夠得到壓倒性的權力。一個派系可能一時比敵對派系享有較大權力，但這種權力不會大到足以會令勝利的派系消滅他的對手和保持永久的支配。」²⁰「派系衝突是以下述假設運作的：派系不能決定性地消滅它的敵對派系。」²⁰

鄒讜則不能同意這一個派系如何運作的假設，他認為黎安友的假設受到法國第三、第四共和的經驗，以及黎安友對中國北洋政治研究的影響。鄒讜認為這些並不適合解析中共政治。鄒讜提出另外的看法，他認為中共黨史中，非正式團體總是朝向取得或保持壓倒性的優勢力量發展，以控制黨內權威的正式制度。亦即一個或更多的非正式團體已心存爭霸的野心；更重要的是，中共政治環境中的結構、意識型態的因素，將使某個非正式團體的結盟得到足夠的權力以擊敗及消滅它的主要對手。²¹

但本文對於鄒讜的推論覺得有幾個地方可以加以補充，第一、派系的形成是人與人關係的建立，縱使某派系領導人被打垮，但其下網絡仍然存在，待有機會時仍可捲土重來，例如文革時的老幹部，被毛所支持的林彪、四人幫整得潰不成

¹⁹ Bialer, *Stalin's Successors: Leadership, Stability, and Change in the Soviet Union*, pp. 65-66.

²⁰ Andrew. J. Nathan, "A Factional Model for CCP Politics," *China Quarterly*, no. 53 (1973), p. 46.

²¹ Tang Tsou, "Prolegomenon to the Study of Informal Groups in CCP Politics," *China Quarterly*, no.65 (1976), p. 103.

軍，但毛死後，舊有的人際關係又再次啟動。第二，中共派系成員是不固定且有可能重疊的，非如民主國家政黨內部的派系，是顯而易見的，如邱義仁，可明確知道是民進黨新潮流系，但是中共幹部屬於哪一派系卻是可以有模糊空間的，因為建立派系的基礎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而一名幹部可能與某人有同鄉情誼，但和另外一人在某時期也有共事的經驗。此種派系重疊的現象，將使得派系鬥爭的激烈程度降低，派系在鬥爭中無法徹底動員，會令派系使不上力來徹底消滅它的敵對派系。

黎安友及白魯恂兩位學者在對派系政治在中國政治系統扮演的角色認為將是持續的；吳玉山與 Dittmer 也認為派系在 80 年代仍持續的運作，影響了 80 年代的經濟循環；²²Moody 甚至於認為派系間鬥爭規則的制度化，將是中國大陸自由化的契機。²³可見派系因素在中國大陸政治系統中的重要性。

然黎安友及 Pye 對於派系和民間社會的互動並沒有多加著墨，本文認為派系在互動或產生衝突時，民間社會力量的支援或意向將也是關鍵，例如鄧小平欲第三次復出時，華國鋒派主觀的並不希望鄧復出，一般的討論認為老幹部擁鄧的力量使華國鋒不得不屈服，但本文認為當時民間社會的看法，也迫使華國鋒做出讓鄧復出的決定。

接著本文將檢閱各區域派系政治與政治民主化的研究。本文並無作各區域和中國大陸民主化比較的意圖，這項工程巨大，非本文所能處理，檢閱這些資料是希望能夠找到一些重要的一般化理論，以作為本文參考。

Pridham 比較南歐四個國家，義大利、西班牙、希臘和葡萄牙的派系政治與政治民主化的關聯，有下列五個發現。

- (1) 他認為一個國家經歷威權或極權制度的長短將影響該國民主政治的發展，這些國家在二十世紀初期都曾有過民主的經驗，民主制度若中斷超過一個世代，也就是二、三十年，派系主義將很有可能在民主化時發生。同時，威權

²² Dittmer and Wu, "The Modernization of Factionalism in Chinese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pp. 467-494.

²³ Peter R. Moody, *Chinese Politics after Mao* (New York: Praeger, 1983), pp. 165-178.

時代不同背景的菁英團體也會影響派系的傾向。

- (2) 在早期的民主化過程中，將可能出現政黨體系瓦解的現象，這將使派系主義有發展的空間，派系主義往往反映了政治菁英對於民主制度的不適應。
- (3) 在政治轉型期，政黨的合併會開始運作，但是新的認同是需要長時間發展的。但是派系的鬥爭將不被局限在新興政黨內部而已，舊有的政黨也有可能會有派系的爭執。
- (4) 階級分化潛在地影響了派系主義，以南歐為例，派系常以傳統的左右派區分，在西班牙則是因城鄉的不同而形成了派系。
- (5) 民主鞏固將會制度化派系主義，透過民主程序來解決派系的問題。²⁴

Geoffrey Pridham 的研究範圍是南歐的民主化，這和中國大陸政治民主化有所不同之處，在於南歐的威權政體多是軍人政體，和中國大陸是共產黨專政的威權不同，共產黨的統治更為廣泛且堅固，社會經濟都被牢牢控制，其研究結果自然不能完全適用。且 Pridham 的研究主要是在探討民主化至民主鞏固期間派系的發展，和本研究較沒有具相關性，本研究主要是研究派系政治如何啟動民主化的轉型。但是 Pridham 以歷史、文化、對民主的接受度，三個面向作為研究途徑可作為參考。

Paul G. Lewis 以派系的角度研究東歐的民主化，Lewis 認為可用兩個角度觀察派系和政黨的關係，第一個觀點是將派系視為政黨內的組織，例如日本的自民黨，即是派系的聯合。第二個觀點則是從歷史的發展去看，派系是政黨的雛型，隨著政治的變遷將發展為現代政黨。在政治參與及政治制度化的程度尚低時，派系在現代化過程中將扮演打破傳統政治行為模式的角色。派系原本僅是一小群人，無組織且可能隨時消失，往往只是反映某個人及其親朋好友的利益。當某個議題發酵，造成政治光譜極化的產生時，派系才會開始尋求聯合，並且尋求群眾的支援，發展成有效的組織。政黨體系也開始成形，政治參與及政治制度化也在

²⁴ Geoffrey Pridham, "Party Systems, Factionalism and Patterns of Democratization: Cross-National Comparisons in Southern Europe," in Richard Gillespie, Michael Waller, and Lourdes Lopez Nieto, ed., *Factional Politics and Democratization* (Portland, Or.: Frank Cass, 1995), pp. 8-30.

這情況下發展。而在波蘭，派系作為政黨內部的組織並不明顯。²⁵

在東歐的政治轉型中，給了派系主義發展豐沃的土壤，政黨體系多半是隨著政治菁英層面，而非隨著基層社會團體發展。議會運作帶來其中各派系的合縱連橫，各派系進而發展為政黨。土耳其的 1970 年代的民主化是由於政黨內部菁英的衝突，結束了一黨的統治，而東歐的情況和 1970 年代的土耳其十分類似。

中國大陸政治民主化是否能參考東歐的情況？共產制度在各國發展出不同的特色，在中國大陸自 30 年代即有國際派和毛派對於馬列思想中國化的爭論，但是共產政權作為一特殊的制度，自然各共產國家的政治變遷有其共同之處。吳玉山認為中共政權的極權主義階段並不是因為中國帝王觀念、封建思想、小農經濟所產生的獨特產物，綜觀各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發展，會發現共黨政權發展過程中都會有如中國大陸毛時代的極權主義階段。²⁶因此東歐民主化的經驗是值得本文參考的。

Richard Gillespie, Michael Waller 和 Lourdes Lopez Nieto 所編 *Factional Politics and Democratization* 包括了南歐及東歐的案例，以比較各國政治發展建立了派系政治與政治民主化關聯的一般性理論。在本書的導論，Gillespie 和 Waller 首先指出，在威權轉型過程中，派系可能扮演的角色有兩種，一種是開啟民主化的開創性角色，另一種角色則是妨礙了穩定的政黨體系運作。另外在南歐和東歐的威權體制也有所不同，南歐的威權體制多是軍人掌權的右翼政府，而東歐則是共產黨專政下的威權政體。²⁷

而四個值得一提的不同之處，一是南歐曾經有過民主政體的經驗，但當時的經驗是混亂的，小黨林立、派系鬥爭的情形造成政治不穩定，不是個有效率的政體。因此在民主化過程中，南歐不僅會反思威權體制的經驗，也會追溯到二十世紀早期失敗的民主經驗。第二，東歐更缺乏聯合內閣、聯合政府的經驗，南歐政

²⁵ Paul G. Lewis, "Poland and Eastern Europe: Perspectives on Party Faction and Factionalism", in *Factional Politics and Democratization*, pp. 102-124.

²⁶ 吳玉山,《共產世界的變遷》(臺北:東大,1995),頁3。

²⁷ Gillespie, Waller, and Lopez Nieto, *Factional Politics and Democratization*, pp. 1-7.

權即使在威權體制中，仍較為偏向有限多元(limited pluralism)的統治方式，不若東歐為共產黨的專政。第三，南歐和東歐相比，南歐較急於加入歐盟，加入歐盟有一條件，即必須為民主國家才得以加入歐盟，因此影響到了它們的民主化。來自歐盟，從外部推動南歐民主化的力量較為強大。最後，南歐通常會視派系政治為妨礙民主政治的阻力，會造成沒效率的政府及政治體系；但在東歐，由於經過了長期的一黨專政，東歐會認為政黨內部的派系是健康的，是民主的象徵。²⁸

但 Gillespie 和 Waller 認為經由比較南歐和東歐的政黨角色，政黨與派系行為的關聯，仍可發現在轉型過程中許多相似之處。

相較於西歐，東歐和南歐位於邊陲，沒有強大的市民社會，因此這兩個區域的民主化多是「由上而下」進行的。威權統治的末期，政治菁英普遍來說缺乏競爭性政治(competitive politics)的經驗，也不熟悉如何管理政黨內部的關係。政黨的領袖仍然利用舊時代他們所熟悉的扈從主義來鞏固他們的權威。而轉型期才出現的新興領袖，由於他們的資歷尚淺，政經資源明顯不足，只有有限的權威，他們發現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必須聯合，透過選舉進入國家機器中，他們的組織才能夠獲取來自國家的資金。²⁹

群眾的力量是轉型期重要的政治資源，面對選舉，政治菁英必須獲得群眾的支援，而通常這些政治菁英的訴求無非是對舊政權的批評、挑戰，憑藉著改革者的形象塑造自己的個人魅力。但是儘管政治人物是靠著選舉獲得權力，但並不代表他們是由民間團體的力量所推動而產生，政治人物和其政黨的成功，更多是由於西方的政經資源援助，及操作媒體(特別是選舉期間)的手段高明。派系政治的情形在政治轉型期間十分頻繁，尤其轉型期若拖得越長，則派系活動越活躍，而民主鞏固期則是縮小派系政治的範圍及影響力。³⁰

Gillespie, Waller 和 Lopez Nieto 比較分析南歐和東歐在民主化期間的派系政

²⁸ 同前註。

²⁹ 同前註。

³⁰ 同前註。

治，認為有四個主要問題點和結論。

首先，派系的定義為何？派系在各個領域間的意涵多少有點不同，而民主化期間派系的定義為何？派系在政治學領域的定義，派系是一群人所組成，同時它是一個政黨的一部分，派系間會有政策、意識型態、職位、權力、利益的競爭。而轉型期間的派系更加地把政黨當作工具，做為選舉時的一個標籤或輔助。而且派系的目標不局限於成為政黨內的實力團體，它們更期望的是取而代之，發展成為一個有效的政黨。

其次，什麼因素將影響派系的行為？Gillespie, Waller 和 Lopez Nieto 認為(1)如前所述，民主化之前的威權政體形式將影響派系行為的不同，基本上可分為南歐和東歐兩種型式，但二者亦有可供比較的相同基礎；(2)各地區文化因素不同，派系行為會有當地色彩，但一般說來，扈從主義越壯大的地方，其派系活躍的程度越大；(3)制度的因素會影響派系行為，政黨體系在轉型期間發展，沒有制度化的不確定性，會使派系行為活躍。

第三，派系行為和民主化的關聯為何？派系扮演了民主化的催化劑，但並不只是旁觀者，也是轉型期中的主體。派系可以崩解、弱化一個政黨，但派系也可以融合其他團體，建立新的政黨。

最後，透過南歐和東歐數個個案研究後，可發現的是儘管各地有所不同，但開放性的結構，和不被某政黨獨占的競爭性政治體系都在這幾個國家民主化後產生。³¹

如同 Gillespie, Waller 和 Lopez Nieto 所指出，南歐、東歐的民主化有所不同，但仍可歸納出一般性的理論，探討派系政治與政治民主化的關聯，中國大陸同為第三波民主化的一個案例(雖然是失敗的)，也和東歐一樣是除民主化轉型外，還包含了社會主義政治、社經體制的改革。為何南歐、東歐民主化可以成功，中國大陸民主功虧一簣？本文將試圖解答這個問題。

³¹ 同前註。

阮銘所著的《鄧小平帝國》則描述毛後的派系政治。阮銘把鄧掌權前分為包括鄧小平、胡耀邦為首的實踐派和以華國鋒、汪東興為首的凡是派，另外葉劍英、李先念一開始也支援華國鋒，而王震出乎意料的是站在胡耀邦這邊，因為胡耀邦為其平反出力甚多，在這波權力鬥爭中，鄧小平順勢的借用了民主牆運動的力量來對抗凡是派，「群眾貼大字報是正常現象，是我國形勢穩定的一種表現。我們沒有權力否定或批判群眾發揚民主，貼大字報。群眾有氣要讓他們出氣。」最後於十一屆三中全會在思想上和組織上都取得支配地位。但在鄧達到其政治目標之後，不僅提出四個堅持，並取消四大自由，逮捕數名在民主牆運動發表不滿鄧、共產黨言論的活躍份子。³²

而在鄧小平登上最高領導人的位置後，阮銘將中國共產黨分為數派，(1)教條主義派，包括經濟領域的陳雲、姚依林、宋平，思想文化領域的鄧力群、胡喬木、熊復、吳冷西、胡繩……等，後來又爭取到李鵬。(2)槍桿子主義力量，包括王震、楊尚昆……等，阮銘認為在中共「黨指揮槍」的原則還是被遵奉的，從沒有成為一個獨立的系統，誰掌握了黨的最高權力，軍方就會支援誰。(3)自由民主派，以胡耀邦為首。(4)新權威主義派，以趙紫陽為首，主張經濟自由與政治專制的兩元結構。而鄧小平則是位於置高點，全盤掌握、操作各派系的競爭與聯合，以達到自己的政治目標。³³

阮銘作為中國大陸政治轉型期的局內人，其文章內容很深入的描述了毛後中國大陸派系間的關係，對很多事件的觀察也有其獨到之處，充分地具有參考價值。但阮銘的文章很多含自己本人的情緒，且以敘事性為主，較少理論的探討。且阮銘認為鄧小平的雙重性格，造成鄧小平時而支持改革，時而因其深層意識中軍事暴力情結與家長獨裁情結而反對改革。³⁴但本文認為鄧的思考邏輯其實一直很明確，經濟改革擺第一，政治改革僅僅是配合經改的配套，絕不能危害到共產

³² 阮銘，《鄧小平帝國》(台北：時報，1992)，頁 41-53。

³³ 同前註，頁 120-126。

³⁴ 同前註，頁 174。

黨的領導，另外，政治控制可以放鬆，但是若有危害到共產黨的跡象發生，必定迅速抓緊政治控制，「改革開放」與「四個堅持」兩個政策，絕對不容任何的改變。

陳明通以派系政治的角度，研究國民黨統治下的政治變遷，他利用 Linz 四個觀察威權統治的指標，配合台灣經歷威權統治到民主化的四個階段來歸納分析派系與威權統治的關聯性。

從他的研究歸納，派系結構的不穩定會造成威權政府統治能力的下降；反之，派系結構的愈穩定，國民黨的威權統治能力就愈強。陳明通認為在台灣，派系政治有利於威權統治，尤其是國民黨與地方派系構成的統治聯盟，使得威權政體十分的穩定；他也提到，派系鬥爭為台灣政治民主化帶來契機。

陳明通所說派系政治有利於威權統治是指地方派系與威權政府的結合，而派系鬥爭帶來民主化契機是指威權政府中的派系鬥爭，區分兩種類型派系政治的概念是必要的。陳明通在分析台灣派系政治時，即是分中央及地方派系來討論，地方派系在此時以雄厚的資金，及地方的人脈在選舉中嶄露頭角，不但脫離國民黨控制，甚至被國民黨所依賴，反客為主，國民黨的統治能力大大下降；³⁵民主轉型期的國民黨中央派系政治分為主流派和非主流派，兩派政爭連連，就在國民黨派系結構不穩定這段期間，台灣政治民主化有了關鍵性的進展，李登輝援引社會反萬年國會的力量，和「野百合」學生運動進行良好互動，進行政治改革，使自己登上「至高領袖」的地位，才又進入派系穩定時期，但是無論民主改革是李登輝的信念，或是他權力鬥爭的工具，台灣的政治民主化就在國民黨中央派系鬥爭的時期展開，並在李登輝取得「至高領袖」地位時完成。³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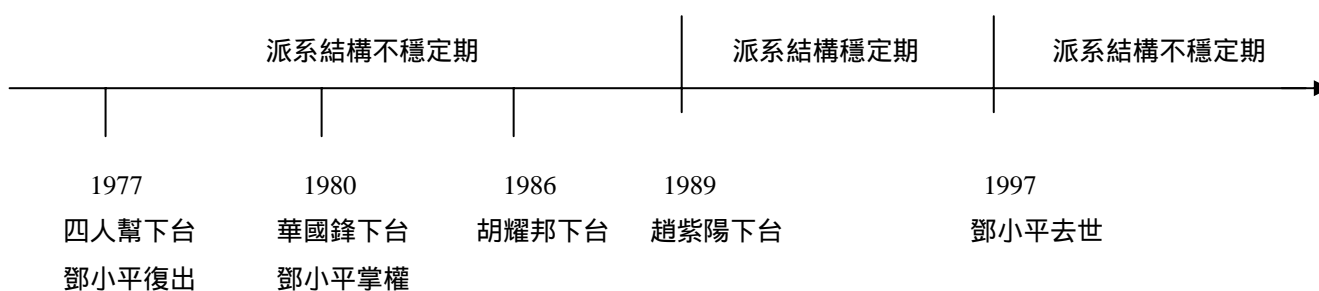
另外，陳明通也用了同樣的理論架構解釋了中共毛後的政治轉型，陳明通認為毛死後中共中央即進入了派系結構不穩定期，直到 1989 年趙紫陽下台，中共的派系結構才進入穩定期。陳明通認為鄧小平在六四鎮壓後才取得「陳雲集團」

³⁵ 陳明通，《派系政治與台灣政治變遷》(台北：月旦，1995)，頁 221-259。

³⁶ 同前註，頁 191-221。

的信任，登上派系「至高領袖」的地位，六四給了鄧小平登上至高領袖的歷史機會；另外陳明通也認為在六四軍事鎮壓後，中共統治正當性受到打擊，因此中共之後加速經濟改革，以經濟發展重新取得統治合法性。³⁷

圖一之一 鄧小平時代中共中央領導階層派系政治演化過程



資料來源：陳明通，鄧小平時代中共中央領導階層派系政治，《當前兩岸政治研究論文集》(台北：月旦，1995)，頁 185。

本文同意陳明通說法，毛死後經歷了一段派系結構不穩定的時期，四人幫、華國鋒、鄧小平三派有過一段複雜激烈的鬥爭衝突；但本文對陳明通的研究有幾個不同看法：

一、所謂「陳雲集團」存不存在？本文認為，儘管陳雲在經濟上與鄧小平有不同意見，但陳雲並沒有政治野心，從陳雲的從政經歷來看，陳雲屬於典型幕僚人員的個性，在黨內直言無諱，只在內部會議上設法影響決策，但當政策已定，他便忠實執行，不違抗黨的決定，不在公開場合議論時政。³⁸鄧陳在經濟上有分歧，在政治上沒有尖略矛盾，更不存在權力鬥爭³⁹，姚依林、李鵬等的經濟主張和陳雲類似，但以「集團」稱之，本文認為太過高估了陳雲的政治野心。

二、鄧小平何時登上派系至高領袖地位？中共派系結構何時進入穩定期？本

³⁷ 陳明通，鄧小平時代中共中央領導階層派系政治，《當前兩岸政治研究論文集》(台北：月旦，1995)，頁 266-269。

³⁸ David M. Bachman, *Chen Yun and the Chinese Political System*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5), pp. 145-146.

³⁹ 閻淮，《中共政治結構與民主化論綱》(台北：陸委會，1991)，頁 26。

文認為自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鄧小平已經登上派系領袖的地位，中共黨內派系結構大致底定，從幾個重大事件決策來看，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運動的開始與迅速結束，1987年1月胡耀邦下台並擴大反自由化運動，同年1月底反自由化運動又迅速喊停，1989年趙紫陽下台，六四的軍事鎮壓，就本文的收集到的資料，都是由鄧拍板決定的。改革派與保守派同樣地都只有建議權，保守派在經濟上改變不了鄧小平對改革開放的決心；同樣地，改革派在政治上也無法改變鄧小平對四個堅持、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決心。

三、六四鎮壓使中共喪失統治正當性？本文認為六四軍事鎮壓反而是中共以「恐懼」重建統治正當性的手段，在六四之前，中共僅以「改革」作為統治正當性，但改革產生了嚴重的社經亂象，在1989年引發大規模群眾運動，使中共面臨威權政體崩潰的危機。雖然中共統治能力沒有降低，但因為十年改革期間，中共對民間社會政治控制的放鬆，群眾遺忘、並且不再懼怕共產黨的權威，也因此中共必須以強硬手段使群眾重拾對中共的恐懼，以恐懼做為統治合法性來源之一。

對於上述看法，在後面幾章將再做探討。

第三節、研究方法及進行步驟

本文以過程途徑，並注重派系在轉型過程之中扮演的角色，配合中國大陸1976-1989年的黨史與政治發展，研究中國大陸政治民主化。

民主化理論主要分兩個流派，一是強調經濟、社會發展與政治民主的正相關性，特別強調總體的政治、社會、經濟因素，認為經濟發展將培育出大量的中產階級，當人們收入越豐，處於複雜而廣泛互賴的工作情況，教育程度提高，而且更易取得衛生及其他服務時，他們將可能要求擴大政治自由。⁴⁰但另一派學者則認為經濟發展與政治民主或許具正相關性，但並非民主化的關鍵，像拉丁美洲及東亞的經濟發展，反而鞏固了威權政體的統治正當性。⁴¹政治變遷無法以經濟、社會、文化等條件來決定，行為者的策略、行為者之間的互動模式、突發事件的影響，才是民主化的關鍵性因素。例如新加坡，人民對目前有效率的威權政府仍感到滿意；而台灣，70年代國民黨政府對台灣人民的統治正當性在當時來自黃帝以來的法統及台灣經濟奇蹟，尤其經濟的成就更穩固了其威權體制的持續，⁴²經濟成長促進政治民主的理論顯然不適用於這些例子。又以台灣為例，以過程途徑研究，若非李登輝的個人意志，及台灣本土民族主義興起造成國民黨來自法統的統治正當性遭受挑戰，民主化不一定會開始進行，因為國民黨領導菁英的分化及李登輝與民進黨的互動，成就了台灣的民主化。⁴³而台灣經濟發展及社會狀況則較不被此種民主化理論所關心。

簡而言之，民主化的理論一是強調「前提」，另一是強調「過程」。本文以過程途徑來探討民主化，自然會將民主化視為一個動態過程，但是若過份地忽略了社經、文化背景，對於有些事件又無法解釋完整，因此本文將在不否定社會總體

⁴⁰ S. M. Lipset, "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no. 32 (1959), pp. 219-2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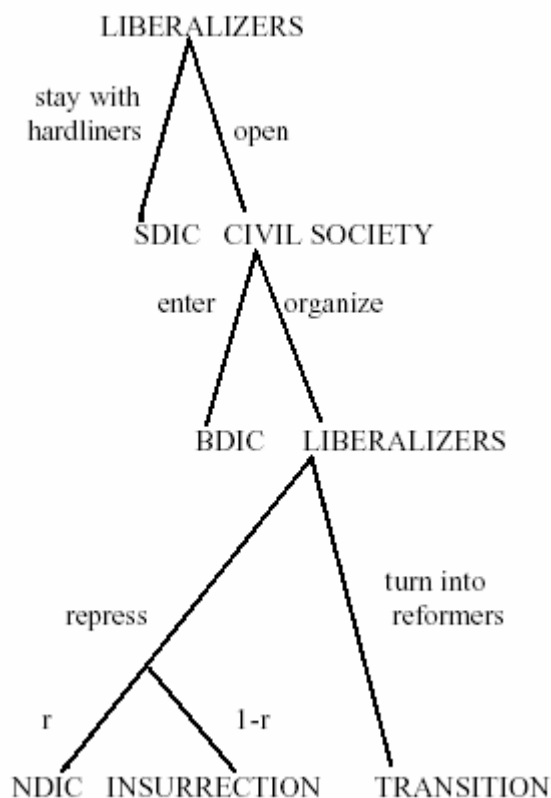
⁴¹ Guillermo O'Donnell, *Modernization and 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ism: Studies in South American Polit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pp. 12-15.

⁴² Stephan Haggard and Robert R. Kaufma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4.

⁴³ 倪炎元，《東亞威權政體之轉型》(台北：月旦，1995)，頁 281-289。

條件的重要性下，採用強調過程的民主化理論。

圖一之二 Przeworski 的政治轉型過程圖



資料來源：Adam Przeworski, "The Games of Transition," in Scott Mainwaring, Guillermo O'Donnell, and J. Samuel Valenzuela, ed., *Issues in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92), p. 112.

如上圖，政治轉型的過程將從政權內分為保守派和自由化派開始，自由化派可以開始有所選擇，首先，自由化者可以選擇維持現狀，和保守派繼續合作，即是所謂 SDIC(status quo dictatorship, 維持獨裁現狀)，或者，他們可以選擇開放，給予市民社會發展的空間。第二步，當市民社會有了雛型，已經有了非政權控制，具自主性團體時，這些團體可選擇進入政權內，形成 BDIC(broadened dictatorship, 基礎較廣的獨裁)，或者，他們可以更進一步的組織成為更強大的力量。第三步，又輪到自由化派的抉擇，市民社會的力量越來越大，自由化派必須選擇成為改革者和他們結盟，往民主過渡，或是選擇鎮壓市民社會，若政權的能

力仍大於民間社會，將進入 NDIC(narrower dictatorship, 基礎較窄的獨裁), 反之，民間社會將會起義、暴動，試圖推翻威權政府。⁴⁴在毛死後，中共政權內部出現了自由化派，對民間社會的政治控制較為放鬆，而市民社會也越來越強大，最終中共政權終於需面對要進行民主過渡或是鎮壓的決定。本文將利用此研究架構解釋 80 年代中國大陸的政治轉型及其最後民主化的失敗。民眾的力量會不時地被中共黨內各派系所運用，以學生運動來說，改革派可能會藉此要求政治的開放，但是保守派也可能會希望學生鬧兇一點，那樣他們就有理由要求鄧小平實行較為保守的政策，減緩改革速度，甚至於逼迫改革派的領袖下臺。群眾的力量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慢慢地被喚醒，進而介入中國大陸的政治轉型運動。

而本研究的另一個重點，是中共高層間的派系政治，派系政治是一個充滿衝突的政治型態，政治的本質即是衝突，因為每個人都希望能掌控資源，但是派系政治的衝突更加地劇烈。派系是以領導者個人為核心，受制於個人的魅力、能力，無法籠絡到所有的成員，因此會有多個的派系產生，在爭取資源的過程中自然產生劇烈衝突。在一般的政治正常情況下的政治，可透過權威性的分配規則解決或減緩衝突的程度及規模，但派系政治的產生，多在權威性的分配規則解體、尚未建立的社會中產生。由於沒有一個權威性的規則，派系間的衝突不斷。

派系在西方學界，最早是用在社會人類學的研究，認為派系行為是傳統鄉村的政治組織的一種普遍現象，將派系視為「恩庇 依隨」(patron-client)關係的具體表現。「恩庇 依隨」關係是一種非正式的特殊互惠關係，其中恩庇者(patrons)具有較高的權力地位，而依隨者(clients)則透過追隨恩庇者，以對其的服從及效忠來換取資源。雖然依隨者通常為較弱勢的一方，但是依隨者亦擁有恩庇者隨需要資源，兩者互相需要，互為依存。「恩庇 依隨」關係的存在代表了統治菁英對非個人化的領導方式的不信任，必須依賴對團體的掌握來完成政策目標。⁴⁵

⁴⁴ Przeworski, 《民主與市場》，頁 77-78。

⁴⁵ Robert R. Kaufman, "Corporatism, Clientism, and Partisan Conflict: A Study of Seven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in James M. Malloy, 1977, *Authoritarianism and Corporatism in Latin America*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77), pp. 109-148.

而後西方政治學者亦將派系途徑運用至政黨研究，如 V. O. Key 研究美國南方一黨州(僅有共和黨的派系)的派系行為⁴⁶，Giovanni Sartori 研究義大利的基民黨(九個派系組成)、日本的自民黨(派系的聯合、派閥政治)，分析歸納出選舉制度、意識型態和派系的關聯。⁴⁷運用至中國研究，Andrew Walder 利用派系途徑研究中國大陸工廠車間的權力關係，⁴⁸Jean Oi 則是利用此途徑研究農村幹部與農民間的關係。⁴⁹

在毛澤東時代，權威的價值分配就是毛澤東，毛澤東的每句話都是真理，毛時代中共間的派系衝突，可由毛全盤掌控，劉少奇、林彪、四人幫、鄧小平，各個中共要角的大起大落都受制於毛。雖然政治高層走馬換將頻繁，但是規則還是在的，只要作為符合毛澤東的意志，及不要侵犯到毛的地位，即可享受的毛所給的資源。

但在毛死後，權威性的分配規則解體，毛的「你辦事，我放心」小紙條，終究無法建立起華國鋒統治的正當性，證明了毛澤東終究是人，不是上帝，不是耶穌基督，死後僅有剩餘價值，並沒有光環。派系衝突在毛死後搬上檯面，並且少了毛澤東這個因素後，哪個派系能在衝突中獲取利益？

黎安友建立了派系互動的典型模式，共計十五點：

- (1) 一方面，征服對手，受到有限的派系權力本質的阻撓，另一方面，衝突的內容也受到國內法的限制。在一個法治的政治系統內的派系，沒有允許其殺人、監禁和沒收對手財產的權力。
- (2) 由於派系缺乏建立足夠的力量去清除政治系統內敵對的派系，所以當敵對派系企圖擴充權力的時候，一個派系首要之務是先鞏固自己的權力，然後再設法增加自己的權力。

⁴⁶ 參閱 V. O. Key, *Southern Politics in State and Nati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49).

⁴⁷ Giovanni Sartori, 《政黨與政黨制度》(台北：韋伯，2000)，頁 113-122。

⁴⁸ 參閱 Andrew G. Walder,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⁴⁹ 參閱 Jean Oi, *State and Peasant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Village Government*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 (3) 當某一派系有先發制人的機會時，它通常會先秘密的進行，然後發動突襲。
- (4) 在此種機會來臨時，系統內的其他派系採取防禦性的方式，且傾向於聯盟，此時派系政治體系亦企圖阻撓強勢領導者的出現。
- (5) 派系的聯盟沒有固定性，今天的敵人很可能是明天的朋友。
- (6) 在初期的同盟狀況下，兩個不可能在意識型態上獲得一致。
- (7) 當決策被整個派系制定後，等於在派系中得到共識。
- (8) 對於決策的共識常存在著週期性，形成週期的原因是政治危機，當危機惡化之後，派系之間往往失去一致性。最後某一派系或派系同盟獲得權力，組織一個新的領導體系。
- (9) 派系衝突有時是來自各別成員的關係，亦即為了個人的名譽或職位而導致派系間的衝突。
- (10) 派系有時也會為了抽象的意識型態、名望、面子等而產生衝突。
- (11) 任何派系都是由有限的派系組成，因為在一個多派系競爭的環境裡，每個派系都會拉攏中間派系避免其倒向對方。
- (12) 當一個派系政權受到外國侵略或軍事攻擊威脅時，派系將會集中在一個適當的領導者之下，以維持這個體系。
- (13) 派系系統內的政治人物，競相對政權和領導者表示效忠，並將政權和領導者的每一個主張和行動合理化。
- (14) 每一項決策總會對某些派系較為有利，所以共識是必須的，且派系間內部菁英份子問題的解決是緩慢和困難的。
- (15) 在缺乏外界壓力的情況下，派系內部沒有能力積聚足夠的力量去推翻派系體系。⁵⁰

本文有兩個基本假設，一、派系間會合縱連橫，獲取本身最大利益。二、派系為在聯合過程及對抗過程中據有有利位置，會援引社會力量。黎安友的十五個

⁵⁰ Nathan, "A Factional Model for CCP Politics," pp. 46-52.

原則在分析解釋本文第一個基本假設時將作為重要的參考，然黎安友對於派系如何影響群眾的動員等沒有進行討論，這是本文預計的研究重點之一。另外，本文以過程途徑研究 80 年代中國大陸政治民主化，因此在派系的分類大體是分為改革與保守兩派，沒有進行太細的分類，因為本文的主要重點是在中國大陸的政治轉型。

由於派系政治的非公開性，對資料的掌握會可能會有些許困難。但是隨著鄧小平時代的結束，距離六四天安門事件也已過了十數年，對於 80 年代的中國大陸高層派系政治的史料也漸漸地整理出來，本文研究除理論建構外也將引用中共黨史作為研究分析的佐證。

本論文預計以六章分析派系政治與中國大陸政治民主化的關聯，第一章導論，和第二章 威權政府如何崩潰？是本文理論的建構；後半則是運用理論來分析中國大陸毛後一波的民主化，也是用 1976-1989 年的歷史來驗證本文前半所建構的理論，包括了第三章 鄧小平時代的來臨，第四章 鄧胡趙體制及其崩潰(1982-1986)，和第五章 民主化的挫敗：天安門事件(1986-1989)。最後，第六章 結論，則對整個民主化失敗的過程做個總結。